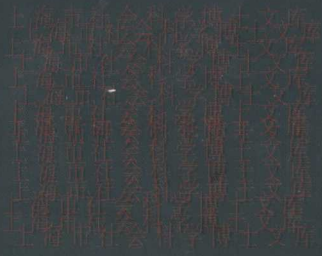




# 结构、历史与行为

何俊志 著

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  
何俊志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ISBN 7-309-04230-1

I. 结… II. 何… III. 政治-派别-研究 IV. D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7987号

## 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 何俊志 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邬红伟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1

字数 274千

版次 2004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号 ISBN 7-309-04230-1/D·268

定价 25.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 容 提 要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史所使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借用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从政治科学发展的范式转变角度来研究历史制度主义这一研究范式的学术价值。本书认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典型范式——旧制度主义充满了内在矛盾，替代它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也同样没有解决这种内在矛盾。历史制度主义则在吸纳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技术性的方法的基础上，重新复兴了政治科学内部的制度研究，缓解了其内部矛盾，并通过制度视角的建立，为当代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视角。

## 序言

一般说,政治科学强调在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中采用经验的实证主义方法,主要回答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是对政治知识的探索和论证。而论证的标准则是证据的充分性和逻辑性的一致。从政治科学产生之日起,就已经有一大批政治学家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其发展的高潮则是所谓行为主义革命和理性选择范式的相继出现。

在行为研究这一翼,政治学家们沿着归纳逻辑的思路,开始不断地寻找和发展证据收集、整理和数据分析的技术,力图通过各种统计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而找到随机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因素。这一范式大致也接受了心理学的假设,即人的行为受动机和态度等心理因素的驱使,并且认为,集体行为只不过是个体行为的汇总。因此,政治文化、选情分析和集团活动就成了他们的研究重点。在理性选择这一翼,政治学家们沿着演绎逻辑的思路,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去深入推演理性的政治人面临各种场景的理性反映,并由此而发展出了平等主体之间的种种博弈模型,也揭示了不少理性人的集体行动困境。这两种研究范式虽然使用了不同的研究逻辑,但是在这种差异的逻辑背后也存在着不少共同的地方。例如,这两种范式都非常重视研究技术的完善、模型的精美和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其研究的起点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假定了政治人的行为逻辑无异于社会人和经济人,政治行

为只不过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都认为宏观后果是微观行为的直接后果；都注重可见行为的研究而忽视制度和文化因素对政治的影响，等等。

应该说，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这种努力，对于政治学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支撑，或者说，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发展本身就构成了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这种努力，无疑为提高政治研究的科学性程度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由于他们都将研究的对象设置在个体和集团的行为上，从而开辟了一个传统政治科学没有充分注意到的新空间，在制度分析之外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行为研究的新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空白。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理论和方法本身的追求，才使政治科学的研究能够走出早期政治科学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杂、只注重对制度做静态分析和提不出理论模式的缺陷，促使政治科学本身在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讲，我们认为，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还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

但是，任何事物的极端发展都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过分注重方法、技术和理论本身的追求，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对工具的过分重视可能会掩盖、替代和偏离对目的本身的追求——对政治现实的关注。而这种掩盖、替代和偏离又很可能会伤害到政治科学的发展。这是因为，政治科学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而是一门政治的科学。这门政治的科学区别其他科学的重要标志，就是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从通

通过对政治现实的研究而扩大、深化和改进人们对政治的认识,使得政治家和公民在政治活动中都能够依据充分的知识而做出理性的判断,从而有助于人类过上美好的生活。

一门关于政治的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不存在被某些先知绝对垄断的隐蔽真理。在政治领域,所有的知识都是一种开放的公共知识,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了解、研究和检验这些公共知识。政治学家们在通过自己的研究活动说服自己之后,就通过平等的商讨而促使他人接受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反过来接受他人的批评而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推动整个政治知识和政治实践的改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一个民主的政体之下,这门关于政治的科学才能成为—门真正的政治科学。因为只有这种民主政体才能满足普通公民通过独立研究和平等商讨而积累政治知识的制度条件——没有人垄断政治知识,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制度性保障而排除了暴力的威胁。所以我们可以说,政治科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已经不是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绝对“价值中立”的科学,而是一门负载着某种价值的科学。

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科学自身的特殊性质,我认为何俊志的这篇博士论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解读是颇有价值的。

首先,这篇博士论文尽管是对历史制度主义这一学术流派的研究。但是作者并没有就理论谈理论,而是紧紧抓住了政治科学的独特性质,将政治科学的核心关注作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作者的理论假设是,政治科学是一门负载着某种价值的特殊科学,但是这门科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现代科学主义的强劲影响。或者说,政治科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政治价值与科学价值之间的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的存在是作为政

治科学早期阶段的旧制度主义的最大矛盾。而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范式的兴起,则代表了政治科学内部的科学主义思维对政治思维本身的巨大冲击和过度影响。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张力的作用下,试图回归对政治本身的关注,从而平衡政治科学内部的这种价值紧张的一种努力。历史制度主义所张扬的以重大问题研究为取向而不是方法和技术本身的完善为第一取向的观点,以及将是否有助于启示人们对政治的认识而不是模型本身的完善作为政治科学最高评价标准的做法,显然代表了这种新的努力方向。

其次,作者还从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出发,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来源的分析,从范式转换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科学理论发展逻辑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作者在论文中提出,传统政治科学的旧制度主义主要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则主要是一种微观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盛行的时候,也不能说政治科学已经发展成了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因为,在政治科学的宏观理论、微观理论之间缺乏联结地带,而且,即使在研究对象上也存在着一些空白点。因此,作者就主要从中观理论的角度对历史制度主义在衔接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以及填补政治科学研究的空白点方面寻找历史制度主义的生成动力。作者为此而提出的观点是,历史制度主义既不是一种纯粹的制度的理论,也不是一种行为理论,而是一种联结着制度理论和行为理论的中层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兴趣点在于制度如何影响行为,以及制度、行为和观念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并共同塑造出了某种政治后果。因此,历史制度主义在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填补了政治科学研究在逻辑和内容



上的空白,并在政治科学的分支学科之间起到了重要的联结和中介作用。

再次,除了从整个政治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制度主义之外,作者还试图从制度主义自身流变的角度提炼历史制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线索。在这方面,作者注意到了旧制度主义为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的理论资源,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科学的范式转型不同于自然科学,即一种新范式的产生并不会完全替代旧范式。即使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之时,仍然有一批制度主义者在坚持用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因此,新旧制度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着断裂,而恰恰是有着一条内在贯通的线索。从静态制度描述和纯粹的制度史的研究,到动态的制度与行为的关系研究和历史分析与制度分析结合之间,有着内在关联。作者也注意到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之间也并不是—种绝对的排斥关系,历史制度主义对行为的研究,对个体理性的重视,以及对理论发展的关注等,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承续了这两种范式的某些传统。

与此同时,作者还从制度的重要作用、制度变迁的历史和具体历史进程中的制度与行为的关系这三个层次上,提炼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内在结构。对制度的重要作用的强调代表了初期历史制度主义者在研究公共政策的过程和社会运动时对制度因素的重视。而随着对制度本身的研究的加深,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开始从制度的功能研究转向了对制度自身的产生和变迁历史的研究。对制度变迁的关注反过来又促使历史制度主义者们重新回到现实之中,去关注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的制度变迁的不同模式和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各种关系模式。论文通过这样三个具体研究途径的

整理,从研究层次的深入和体系完善的角度,以实证材料为基础,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内容和特点。

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价值取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的总结,作者提出了历史制度主义是一次重构政治科学的努力。这种重构虽然并没有替代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范式,但是历史制度主义毕竟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之外,开创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种新的范式以其在与新制度主义的交流和对话活动中处于中间地带的独特优势,将会在政治科学的自身的发展和与制度主义交流活动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是政治学恢复和学科初步确立;第二阶段是90年代以后,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无论是学科的内部分化、学科点的普遍设立,还是论著的大量出版和青年学者的脱颖而出,都是80年代所无法比拟的。90年代以来政治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例如领导的重视、学者的努力、学科自身成长的需要,等等。但是,我认为一个基本的方面是得益于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步推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种种改革与转型。

正是这些改革与转型为政治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无限广大的空间。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而且社会主义政治要比资本主义政治更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而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对这一认知的复述和论证,并没有多少的研究余地。同时,从上述认知出发,在思想理论领域,我们对西方的政策是封闭的,是没有交流与交往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政治学的恢复和初步发展时期,在理论上也仅限于对被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认识不像以前那样绝对了,社会主义也存在某些弊端,其优越性有待于进一步发挥,资本主义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时开始翻译了一些政治学论著,主要是行为主义方面的,其研究方法对我国学者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一定启示作用的。然而,在80年代,从根本上说,从政治制度到政治学术,中国和西方并没有多少可以沟通的领域。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推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随后出现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引发了许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内的现实和理论层面上的问题。于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以至现代政府、现代国家、现代政党,以及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利益分化、利益表达、利益整合等概念,都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政治学者的视野,使他们顿时感到,政治学大有有用武之地。政治学的研究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了。

同时,学者们也发现,中国人当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西方学者几百年以前在研究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早就不同程度地揭示出来了。无论是他们的经验,还是教训,都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这样,东西方学术上的内在通道,被一定程度打开了。虽然人们常说,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诸多差异,西方的理论不可能完全适合于中国。然而,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又都是同走的现代化道路。他们的经验教训不会对我们毫无用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研究西方的渴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的“西学东渐”也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潮。这个高潮至今仍有增无减。如果说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中国 90 年代政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话,则新一轮的“西学东渐”则是其重要的外在助力。正是这两股强力,使得 90 年代以后的政治学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并且具有明显的学术化特征。

中国学术的政治化与学术化之辨,不仅是政治学,而且是整个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难解之结。只是政治学由于学科特点,它所遇到的问题比其他学科更敏感、更尖锐罢了。20 世纪 90 年代的政治学学术化倾向说明政治环境相对来说较为宽松,学者具有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事实上,党和政府也需要政治学科为其贡献政治知识,以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效能。但是,这并不是说对政治学术的政治限制就不存在了。限制还是明显的,只是限制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从硬性限制变成软性限制,从政治限制变成经济限制和技术限制。这类限制对政治学的研究方向仍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因而政治的学术化倾向仍然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推动了政治学在一个广阔的空间内去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性的干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仍然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这里所谓的政治学的“学术化”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学术主观态度的一定程度的中性化,即在研究某一问题之前不先作一价值评价,而是以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理论预设、研究方法、资料来源、创新性观点等要持之有据,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并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话语体系,总的说,就是要有学术规范。

所谓“政治性”,即学术研究要符合既有的一些意识形态的要求。虽然有些警戒线是不能突破的,有些禁区也难以进入。然而并非所有界线都是明朗的。两者之间还是有张力的,特别是我国

的意识形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和创新性以后的意识形态之间也有不少差距,这种情况也为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张力增添了不少变数,使学术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扩展空间。

总的来说,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化无疑加强了政治学的科学性,对学科发展无疑有重要意义,但任何事物走向极端以后,就会走向反面。政治学的学术化有可能导致对学术形式、术语、技术的过分追求,而造成思想的缺失。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学还有一些学术的独立思想追求的话,那么 90 年代的学术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追求。

其实,学术性只是对政治学研究的形式要求,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思想内涵。任何这方面的学术都带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观念进入研究领域,都不同程度地通过各个侧面去探讨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和方法,以及如何借鉴西方人的经验与教训。只是我们通过学术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交流和讨论时,缺乏争鸣。所以,我们应该在政治学研究中力争走向学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王元化先生认为,学术和思想是分不开的。思想可以指示学术,学术可以深化思想。不可想象,没有以学术作为内容的思想将成为怎样的一种思想;同样,如果是没有思想的学术,这种学术又有什么价值。他认为,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地位,必须使它依附于学术的外在其他目的。这样一来,政治僵化了,学术也扭曲了。中国近代政治素质的低落和学术思想的衰微是有联系的。我们的这种思维模式,王元化称之为“意图伦理”,并指出这是“五四”运动流传的消极传统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的政治学与政治现实之间则呈现的是一

种正相关的互动关系。政治现实的发展、演变客观上推动了政治学的研究。而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政治现实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批判精神。不管是建构性的,还是解构性的,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现实政治也可以从中有选择地吸取营养,以利于推动自身的改革和完善。两方面可以说互相推动,相得益彰。西方政治学的学术思想史的丰富多彩和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演进,似乎可以从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得到某种解释。

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学术化,以及政治领导对政治学科的重视,毕竟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机遇和挑战,也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注入了活力和希望。人们期待着能在学术和政治的磨合和互动中,创造出—个双赢的局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春天。

孙关宏

2004年7月15日 于复旦园

## 本书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而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大流派中,真正从政治科学的传统中生发出来,最早成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新制度主义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对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宏大理论的反动,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主义重视制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理论的综合,在制度的中轴上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模式。自这一流派产生以来,其理论框架不断扩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理论和方法的自主性也不断提高,从而构成了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相并立的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

随着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和理论影响的不断扩大,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目前在西方对历史制度主义进行研究的取向主要有三种,即制度取向的研究,强调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政策取向的研究,强调历史制度主义从制度角度展开公共政策研究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文化取向的研究,强调历史制度主义对文化理论所构成的冲击。这三种研究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历史制度主义所取得的某些成果,但是都有各自的不足之处,都没有能够看到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对政治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全面影响。而国内政治学界对历史

制度主义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本书试图从整个政治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历史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内部的学术价值。为此,本书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史所使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同时借用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从政治科学发展的范式转变角度来研究历史制度主义这一研究范式的学术价值。

本书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政治科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政治科学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衡量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有效性时有着独特的标准,即政治科学的实践性和学术性的统一。从这一标准出发可以推论出,传统政治科学的典型范式,即旧制度主义范式是一种充满着内在矛盾的范式。这是因为旧制度主义生发的现实动力来自于美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的需求,为了维持和改进某种政体而产生的政治科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实践的科学的政治使命是维持和改进某种政体的运作,其所能提供的政治知识也只能是有关特定政体的有限知识概括。但是,由于现代政治科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承接了自然科学的传统,力图按照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而将政治科学提升为一门提供普适性知识的理论科学。从而,作为一种地域性知识的政治科学与作为一门普适性理论的政治科学之间,以及作为一项政治事业的政治科学和作为一项科学研究的政治科学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内在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存在,才导致了旧制度主义的解体以及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对政治科学的重建和对旧制度主义范式的替代。但是,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这种替代并没有能够有效解决政治科学的内在问题。因为两种理论范式都在科学主义影响之下力图将政治科学提升为一



门普适性科学的范式,但是同时却弱化了政治科学的实践性特征。在后行为主义的理论背景下,历史制度主义在吸纳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技术性方法的基础上,重新复兴了政治科学内部的制度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这一重建在重申政治科学的实践性特征的同时,也在中层理论的框架下致力于理论模式的构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政治科学内部的这一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内在矛盾,缓解了政治科学的实践性与学术性的矛盾。而且,通过制度视角的建立,历史制度主义也为政治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视角。但是,历史制度主义的这种复兴已经不是一种对旧制度主义的复归,而是一种在新的基础上的超越和重构。在简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视角之后,本书将分三部分七章具体展开全书的写作。

第一部分为本书的假设提出和初步论证。在第一章中,本书提出,在传统的政治科学中存在一种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即旧制度主义范式,这一理论范式有着统一的概念、理论、方法和信仰。通过对现代政治科学产生与发展过程的实证考察表明,现代政治科学既是作为自由民主政体的一项事业而产生的,又是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作为一项社会科学学科而产生的。从而,在作为一项政治事业的政治科学,与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政治科学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早期政治科学家们裂变为两大阵营。在实用主义哲学思维的强大影响下,科学主义取向的政治科学家们加大了对自然科学的引进力度,从而导致了强调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政治现象的行为主义的兴起。第二章主要分析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范式这种替代了旧制度主义范式的新范式。作者在这一章中提出,替代了旧范式的行为主义